

2301

新都文史

(十二)

教育专辑之二



新都文史

〈十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四川省新都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新都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 席：李泽先

分管副主席：李长衡

主 任：李希绪

副 主 任：吴光奎

委 员：袁礼金

邵志一

戴德宗

胡华栋 陈廷乐

李义让 王光荣

袁圣谟

本辑主编：袁礼金

责任编辑：王光荣

校 对：戴德宗 王光荣

ZA48/25

目 录

人物春秋

双肩挑重担 一心育人才

——胡代光简介..... 肖灼基(1)

教坛宿将周虚白 李义让(15)

为中外文化交流作贡献的人

——记翻译家黄新渠教授 王 江(20)

著名医学博士何光麓简介 县志办(26)

学府女杰

——记云南大学经济系教授孙德华 任 敏(29)

书艺广传的书法家蔡根泉 胡尔炽 周述义(36)

忆祖父骆醉仙 骆光斗(40)

黄门秀士曾海门 胡尔炽 刘钰珍(45)

往事回首

2A48/25

忆抗日时期军医学校学习生活	史焕清(48)
战地文艺兵	汤重稀(52)
抗日时期迁校到新繁的协进中学	胡尔炽(63)
旧社会教师的悲惨生活	袁圣谟(66)
回忆城关一完小速成班	张发金(71)
克服解放初期学校混乱现象	文史委(73)
依靠群众办学 实行勤工俭学	清 泉(77)
新民农中是培育我们成长的沃土	
——忆新民农中及其几个年轻人	刘军才(82)
新都城关民中	张述先 陈德震(92)
土改胜利,建设学校,充实设备	袁圣谟(95)
我省第一个中师函授部	廖远修(100)
大跃进高潮初退时的新都师范教育	
——从新都幼师到新都师范函授部的一段教学生涯	
.....	李义让(106)
我所知道的新都“五·七”学校	张德威(115)
旧貌新颜	
——新都中小学校舍建设成就简介	戴德宗(126)

人物春秋

双肩挑重担 一心育人才

——胡代光简介

肖灼基

胡代光，号谦尊，1919年5月5日生于四川省新都县，现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学院院长，是我国研究西方经济学著名专家。

一、书香门第 少年有成

胡代光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家庭，父亲是清末秀才，熟悉历史、古籍和诗词歌赋，母亲也知书识字。少年时期，胡代光在家里就受到严格的教育。两岁多的时候，由母亲教读《三字经》。七、八岁以后，由父亲教读《唐诗》、《大学》、《中庸》、《诗经》、《左传》，并练习做旧体诗。他禀性聪慧，勤奋好学，记忆力很强，一本书只要读几遍，便能背诵如流。

1931年春，胡代光进入新都县小学读书。他学习努力，成绩名列前茅，经常受到老师嘉奖。他在小学开始读鲁迅、郭沫

若、胡适等人的作品，喜欢写白话文。有一次，国文教师出了一道作文题：《论文言文与语体文之优劣》。胡代光在比较分析两种文体优劣时，特别强调语体文的大众化，应该发扬光大。教师阅后十分欣赏，称胡代光“真乃全班之秀”，给他的作文打了一百分。

1935年春，胡代光以同等学历考上新都县立初级中学。1937年秋，他又以同等学历考进著名的成都私立树德中学高中第一班。在中学求学时，胡代光除了喜爱国文，大量阅读唐宋名家文章诗词外，还努力学习其它功课，特别是喜爱数学和英文。在教师指导下，阅读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狄更斯等名家英文作品，并可写简短的英文论文。中学时代打下的数学、英文基础，对胡代光后来从事经济计量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

二、受教名师 苦读经典

1940年7月，胡代光中学毕业后，考进当时迁到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经济系，从此他对经济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把经济学作为终身研究的专业。

在大学一年级的時候，主讲经济学原理的是陶因教授。陶因教授留学德国，崇拜社会法法律学派的卡尔·狄尔，无论讲价值或分配论，他都把各学派的学说分别介绍，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也介绍得比较详细，并以资产阶级观点批判马克思学说，这就引起了胡代光对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兴趣。不久，胡代光学习了刚刚出版的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认真做了笔记，开始了解资本家对雇佣工人残酷剥削的秘密，认识了

“资本主义必然崩溃，共产主义必然到来”这个不可磨灭的真理。

当时，武大经济系讲授经济思想史的彭迪先教授，对胡代光影响很大。彭迪先是马克思经济学者，他在讲解各派经济学说时，都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加以分析批评，使胡代光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有了进一步了解。这个时候，胡代光阅读了许多马列主义经济理论的经典著作。

1944 年秋，胡代光在武汉大学经济系毕业，毕业论文的题目是《资本蓄积论》。

在那“毕业即失业”的年代，找工作十分艰难，胡代光决定报中央大学研究生。当时，国民党统治区许多大学的经济系和整个经济学界都把马歇尔和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奉为“圣经”。许多刚从英美留学回来的教授先生们，无论有意或无意，都在宣传凯恩斯主义的说教，想把凯恩斯的学说硬搬到中国来。为了应付研究生考试，胡代光读了不少马歇尔、凯恩斯学派的著作。

1945 年 9 月，胡代光被录取为中央大学法科研究所政治经济学部研究生。胡代光在中央大学做研究生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正在胜利进行。在国民党统治区，蒋介石反动政权倒行逆施，政治上破坏人民政协，召开伪国大，进行恐怖的特务统治；经济上对广大人民大肆掠夺，工农群众、公教人员生活困苦不堪。胡代光在中大（重庆沙坪坝）念研究生时，生活非常艰苦。那时物价飞涨，劳动人民维持最低生活都很困难。胡代光对“四大家族”的反动统治深恶痛绝，对蒋介石独裁民贼的本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当许多朋友目睹国内形势，谈到如何解决国家前途问题时，他直截了当地说：“只要蒋介石自动

或被动地下台或死去，则中国当前的问题就解决了一半了。”

1946年9月，胡代光随中央大学复员回到南京。不久，蒋介石召开伪国大，发动大规模内战。这时已经成熟起来的胡代光预感到，国民党政府发动的反共反人民战争必然要被正在发展着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运动所粉碎。1947年5月20日，南京大专院校学生举行反内战、反饥饿的示威大游行，胡代光也积极加入了游行的行列。针对当时反动报纸对解放区的诽谤，胡代光在致友人的信件中指出：“古人说，尽信书不如无书，今则尽信报不如无报”。针对有些友人面对黑暗统治和失学失业而悲观叹息的情况，他写信鼓励说：“天快亮了”、“春天不久就要到来”、“我们有伟大前途”，象当时许多进步知识分子一样，胡代光正以欢欣的心情等待着即将到来的解放。

1947年7月，在著名经济学家巫宝三教授指导下，胡代光撰写了题为《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评述》的毕业论文，获经济学硕士学位。从中央大学毕业，经巫宝三介绍，胡代光到湖南大学经济系担任讲师，先后讲授经济循环、经济学原理、货币与银行等课程。

三、深入实际 初获成果

1949年8月，胡代光在长沙迎接解放。他为历史上的伟大变革而狂欢，同一批青年教师组织了“太阳学习会”，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著作，学习党和政府各项政策法规，参加湖南大学的接管工作。

长沙解放后，胡代光迫切希望参加实际经济工作。于是，

他克服种种困难，于1949年11月来到南京。在巫宝三教授等推荐下，他在南京参加筹备西南经济调查研究的工作。不久随第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抵达刚刚解放的重庆，分配在西南财经接管委员会研究处工作。后来，正式成立西南财经委员会。西南财经委员会将近三年的工作，使胡代光在思想政治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西南财经接管委员会和财委工作期间，胡代光多次深入实际，调查研究。1950年春，他在重庆调查了货物税、营业税等缴纳情况以及一些工厂的生产和销售情况，写了调查报告，为政府有关领导部门制订财经政策提供了参考资料。他还经常搜集整理各种实际材料，定期写出财经情况报告。他写的《一年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工作情况的报告》等文稿，内容翔实，资料丰富，对实际工作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他还经常结合业务工作，撰写一些评论现实经济问题的文章。他在1952年发表的《反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统计》一文，批评了一些地区和部门的统计资料和统计数字不够准确和真实的现象，在统计部门有一定的影响。

这期间，胡代光还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参加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先后发表《农村供销合作社几个问题》、《重庆市江北县人和乡土地改革及经济变化情况》等文章，受到好评。从1950年冬至1951年春，胡代光在重庆市江北县参加土地改革运动的试点工作，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反封建教育。通过斗争实践，大大提高了思想觉悟。

四、教育重视调查 研究注重拓新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调整,各大行政区准备撤销,胡代光受聘到北京大学经济系任讲师,从此开始了他在北大三十多年的教书生涯。胡代光在北大执教的三十多年,先后担任北大经济系秘书、副主任、主任、经济学院领导小组组长、院长;1960年他被晋升为副教授,1978年晋升为教授,1956年在北大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胡代光学识渊博,在北大先后讲授多门课程。1953—1960年主要讲授统计学原理、经济统计,1961年以后主要讲授西方经济学和经济计量学,近年又为研究生讲授当代西方学者对《资本论》的研究和新李嘉图主义理论等课程。

多年来,胡代光夜以继日,勤勤恳恳战斗在教学第一线。他既要完成繁重的教学行政任务,又要同一个普通教员一样,为学生讲课、批改作业、带领学生外出调查研究,工作十分繁忙。

初到北大的时候,为了学习苏联统计理论,讲好统计学原理,胡代光每周要到人民大学旁听苏联统计学专家讲授经济统计课,边学边教。他在苏联专家讲授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编写了《经济统计讲义》。

统计工作同国民经济建设有密切联系。胡代光在从事教学的同时,还结合我国经济建设的实践进行理论研究。他在1957年发表的《关于国民经济中平均发展速度的计算问题》的文章,其观点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文章对计算平均发展速度的几何平均数法和方程式法作了较全面的比较分析,认为几何平均数法优于方程式法。他在结论中指出:“万能的统计方法是有的。科学统计方法决定于被研究对象的本质及其特点。就某种意义上说来,几何平均数法本身确实存在

着不可避免的缺点。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应用这个方法的基本条件——环比速度动态数列且有同质性，那么由几何平均数法所求出的平均发展速度仍然有其客观物质性。相反地，平均发展速度方程式法却难免强套数学规律，有陷入形式主义统计的泥坑的危险。”这个结论是很中肯的。

胡代光一贯重视实际经济调查工作，认为这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途径，也是理论工作为实际服务的重要途径。他到北大经济系工作以后，多次带领学生进行调查研究。他主持经济系工作后，虽然工作繁忙，但仍然坚持每年组织一批师生到全国各地进行经济调查，并主张把参加经济调查作为教师晋升的必要条件。参加经济调查已成为北大经济学院一项重要的教学制度。从调查中获得大量经济资料，不仅大大充实和丰富了教学内容，而且帮助有关领导部门了解了情况，受到欢迎。

还在五十年代中期，胡代光曾先后带领学生和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到山西进行农村调查，胡代光在1959年5月写成的《山西省晋城县周村七一人民公社上掌管理区收入分配情况调查报告》中，用大量统计材料说明，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劳动效果。他在调查报告中指出，这个管理区在收入分配中存在着以下三个问题：

(1)1958年的收入分配未能达到“90%以上的社员收入比上年有所增加，其余社员收入比上年也不致减少”这个规定的要求。

(2)由于公社化后取消了自留地，社员已无条件也无时间搞家庭副业，1958年社员每人平均全部收入水平未超过两年前。

(3)1958年同1956年相比较,每个劳动力所摊到的固定资产增长2.4%,每亩土地投工量增增长20.9%,而每亩粮食产量只增14.2%,由于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速度低于单位面积投工量的增长速度,因而使得每个农业劳动日平均粮食产量降低8.7%,每个劳动力所生产的粮食降低了11.7%。由于以粮食生产量计算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降低,每个劳动力所创造的纯收入也随之降低了12%。这些比例关系的变化,说明1958年农业技术装备程度的提高并未能发挥应有的效果;对比1956年,劳动力不仅没有进一步节约,相反地,却降低了劳动效果。因而1958年社员收入还未达到1956年水平。

上述这些实事求是的分析,在那个浮夸成风的年代里,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胡代光在教学和研究中,敢于开拓新的领域,探索新的问题。1961年秋后,胡代光的教学和研究方向转到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方面,主讲凯恩斯主义和经济计量学两个专题。1963年,他与巫宝三、孙世铮合作编写了《经济计量学》教材(全国统编教材,196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首次将这门学科全面、系统地介绍给我国学术界和高等教育界。“经济计量学”这词,也是由他改译(旧时误译为数理经济学)。

结合编写经济计量学教材,胡代光研究了数学方法在理论研究和实际经济工作中应用的问题。针对当时学术界对应用数学方法的一些不同看法,他于1962年11月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在经济研究和计划工作中运用数学方法同资产阶级经济计量学的根本区别》一文,指出两者有四个方面的根本区别:

第一,我们在经济研究和计划工作中运用数学方法,制定反映国民经济现象和过程的经济数学模型,乃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上。而资产阶级经济计量学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现象的计量,则是以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为依据的。

第二,数学方法在我们的经济研究分析中只起着辅助的、从属的作用。与此相反,数学方法成为资产阶级经济计量学的基本研究方法。

第三,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运用数学方法和统计方法进行经济研究和经济计算时,掌握着全面的可靠的统计资料。相反,由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竞争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以及商业秘密的存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可能取得准确可靠的全面统计资料。

第四,我们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问题时,运用数学方法的目的,是要以最简便形式,更合乎逻辑地和科学地揭露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借以唤醒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觉悟,促使他们认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规律。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运用数学方法的目的,是要更深刻地更准确地认识与掌握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最有数地利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同时,通过数量分析,不断改进经济计算和计划计算的工作方法,提高计划工作和管理工作的水平,使国民经济计划更加完善,促进社会主义国民经济高速度、按比例向前发展。相反,资产阶级经济计量学是为帝国主义向外侵略,扩军备战和加强国民经济军事化服务的,是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扩张和垄断资本家集团榨取最大利益服务的。

在文章结尾,胡代光指出:“当然,这也不是说,对资产阶级经济计量学中的某些计算技术方法和部份实际统计资料完全不值得注意。我们必须遵循列宁的指示:‘睁开眼睛来看资产阶级科学,注意它,利用它,批判地对待它,不放弃自己完整的确定的世界观’”。时隔二十多年,现在重读这段话,我们不能不感到胡代光当年的远见卓识。

在致力研究经济计量学的同时,胡代光也注意西方经济学发展的新动向。1960年,英国剑桥大学出版了斯拉法的《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在西方经济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当时西方有的经济学者认为斯拉法的这本书是“一部划时代著作”,对马克思的价值——价格理论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胡代光及时注意到这本书的出版及其影响,于1962年冬在北大经济系经济史、经济学说史教研室读书会上介绍了这本书的基本内容,并指出,这本著作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随后,他用半年时间研究所谓经济学上的“斯拉法革命”,写成了五万字的《评斯拉法的〈用商品生产商品〉》。“文革”以后,他继续从事这个专题的研究,发表了多篇很有份量的研究论文。

五、精神振奋 硕果累累

正当胡代光年富力强,在教学和研究上不所进取的时候,在北京大学,随后又在全国刮起了阶级斗争的风暴。早在1964年,北京大学就被当作“烂掉了”的单位,工作组进驻学校,领导斗争。经济系,由于开设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基本知识而被说成是“搞封、资、修,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经济史经济学说史教研室

定期举行的读书会被认为是“裴多菲俱乐部”。当时主要主持工作的胡代光，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不过，这仅仅是大风暴的序幕。

在严重灾难的内乱“文革”时期，胡代光同当时许多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一样，遭受到严重的冲击和迫害，多次被批斗，被毒打，并被强迫劳动。尽管身处逆境，但胡代光坚信“事物的变化总有一个结局”，“文革”那党不成党，国不成国的局面，不可能长期存在，他满怀信心地等着春天的到来。从1969年9月到1971年9月，胡代光被下放到江西鲤鱼洲，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后来回北大参加部份教学工作。虽然当时在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的条件下，胡代光同其它教员一样，被当作“臭老九”“被改造对象”，但他对教学工作十分认真，热情指导学员学习，做到“有求必应”“诲人不倦”，因而受到工农兵学员的尊重和爱戴。至今，他还与一些已毕业的工农兵学员保持联系。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了。经过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北京大学获得新生，教育改革工作逐步进行。1977年，胡代光重新担任经济系行政领导工作，1978年晋升为教授。尽管这时胡代光已年近花甲，但他心情舒畅，精神振奋。几年来，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取得了很大成果，在经济理论界做了很多工作。

自1977年以来，胡代光为经济系不同专业的学生和研究生先后讲授货币主义和资产阶级通货膨胀理论、西方经济危机理论，资产阶级统计资料分析等专题课程。在教学基础上，他先后出版了《米尔顿·费里德曼和他的货币主义》《现代资产阶级通货膨胀理论批判》等学术专著。这些专著在学术界获

得了好评,全国有影响的《金融研究》在评论《现代资产阶级通货膨胀理论批判》一书时指出:本书“系统而通俗地介绍了截至七十年代末,资产阶级各个流派的经济学家关于通货膨胀问题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同时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对它们逐一进行了分析批判”。胡代光与厉以宁合著的《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一书,在学术界和青年学生中也很受欢迎,成为畅销书。《世界经济》杂志对这本书作了高度评价,指出“这是一本内容丰富,题材广泛的学术论著”,作者“对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主要流派如现代凯恩斯主义的新古典综合派和新剑桥学派,以货币主义、新自由主义、新制度主义、瑞典学派、熊彼特理论体系和罗斯托经济成长阶段论等,作了全面而系统的评述,涉及各派的学说渊源、重要代表人物、理论特征和分析方法以及它们的主要理论”。

近年来,胡代光致力研究当代西方学者对《资本论》的研究。这是由他主要负责的“六五”计划期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之一。众所周知,一百多年来,西方经济学界对待马克思《资本论》的态度,经历了如下变化趋向:沉默——反对——重新研究,作出判断。在作出判断中,尽管“过时论”仍有一定市场,但大多数论断是趋向于“打通”马克思经济学说与现代西方经济学说的“鸿沟”,从而企图实现他们的“经济学革命”。最近四十年来,西方一些同情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也积极开展《资本论》研究工作。他们就《资本论》所提出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与方法、劳动价值观、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理论、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经济危机理论、社会资本再生产图式、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概念问题,发表了各自的